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曲折发展及其原因

郭国祥¹, 李旭辉²

(1.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 华南理工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 毛泽东利用外资的思想充满曲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对外资抱热烈欢迎的态度, 并在艰难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吸引外资, 但到晚年却越来越轻视甚至厌恶外资。这其中的心路历程有着复杂的原因: 综合国力的弱小使中国在利用外资的时候, 很难得到平等的地位, 总要付出很大的牺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偏执的“国际主义”和“传统大国”思想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毛泽东; 利用外资; 曲折发展; 思想; 原因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5-0046-(04)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对如何利用外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可贵的探索, 取得过很多积极的成果, 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 他的探索充满曲折, 到晚年则陷入了误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认真梳理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扬抑轨迹, 并分析其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无疑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曲折发展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发轫于中国革命实践。1935 年, 红军到达陕北后, 人疲马倦, 加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生存相当艰难。此时,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 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加大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必须争取外援。1935 年底, 毛泽东在论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时, 就指出: “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161}, “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1]161},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162}。1937 年抗战爆发后, 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指出: “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但外援是不可少的, 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2] 当他用这种争取“外援”的思想考虑革命问题时, 就形成了对利用外资

的初步认识。

当红军在陕北逐步安顿下来后, 革命力量日益壮大, 生产生活等各种物质需求也同步增加, 如何发展根据地经济就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 进一步认识到外援的重要性, 从而热烈欢迎外资。1936 年 7 月, 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和主张, 在谈到外资时, 毛泽东指出: “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在过去中国政府不能利用外资谋人民真正的福利, 一切外资对民众没有丝毫的补益。只有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以后, 才能尽量地吸取大量的外资, 来发展大规模的生产事业, 也只有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 才能利用这种切要的外资。”^{[3]84} “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以后, 一切外国对华的商业利益将享受空前未有的机会,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力和消费力, 并不是要铲除一切外人的利益, 而是要和许多国家发生关系的。”^{[3]83} “至于援助, 我们很需要, 越多越好。”^{[3]84} 这些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政治条件,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利用外资和进行对外经济交往的强烈愿望。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 尽管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条件十分有限, 但毛泽东还是积极、主动地争取外资, 他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方针和政策, 进行了大胆

[收稿日期] 2009-02-02

[作者简介] 郭国祥(1968-), 男, 湖南双峰人,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的实践。他主张吸收利用外资来发展边区经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到:“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3]¹⁵⁰⁻¹⁵¹。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开放政策,抗日根据地建设搞得红红火火,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了欢迎和奖励海外华侨及外地工商界人士来边区投资的提案。边区政府很快就引进了外资,相继建立了延安难民毛巾厂、振华造纸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延安纬华毛巾厂。陈凌风夫妇投资创办了光华农场,还引进十几条外国种乳牛。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利用外资的战略意义,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成功。

194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时又谈到了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4]毛泽东还明确指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5]¹⁹⁷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汇报中也能证明这一点,他写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工业化,“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外援来实现。他们相信,美国,还不是苏联,将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援助的国家;并且认识到,为了效率和吸引美国投资,对美国的这种参与给以很大自由是明智的。”^[6]直到冷战开始,毛泽东一直对美国援助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已经站在世界经济的高度来认识利用外资这个重大问题。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关于利用外资的主张。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其来源“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利用外资问题。他说: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开办的企业,是允许的,不存在立即取缔的问题。同时在报告中强调了同外国人做生意的问题,有生意就得做,不但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在阐述新中国内外政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外资是非常渴望和热烈欢迎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抑制不住满腔豪情,连忙飞往苏联,寻求外资的援助。在答塔斯社记者就访苏目的的提问时指出:“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8]¹¹⁸对外资期盼殷殷。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中国最先获得了宝贵的3亿美元,后来又陆续借得10多亿卢布。中国利用苏联的贷款,建立起了国民经济的初步基础,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抱着极大的兴趣与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建立过各种形式的合营公司,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新中国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以博大的胸怀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口号,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同丹麦驻华大使格瑞杰生谈话中指出:“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8]²³⁴并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他还认为,必要时可以让外国人和华侨在中国的一定地方办工厂企业。^[9]在这年的6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后就港澳工作作指示时,再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吸收海外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还问有关同志:华侨投资为什么不能自由提取?还说到要解除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反右扩大化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毛泽东对外资的态度变得偏激起来,他开始片面强调

自力更生,对外资越来越轻视和反对。

1959年1月,他在接见巴西巴桑约州州长时说:“中国的建设资金不靠任何国家的贷款。在开头几年,我们向苏联贷了一小部分款,很大一部分不是用于建设的,是军费,如买飞机、大炮等。我们每年都还,还有4年就还清了。总共60亿人民币,已还了一半了。以后一个外国钱也不借,自己完全有办法,因为人民起来了。”^{[3]443-444}1964年1月,在同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的谈话中说:“我们同他们的贸易是不平等的,他们卖设备给我们时,常留一手……我不相信,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可以学会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就一定学不会。”^{[3]589}“撤专家,你们就撤嘛,你们撤了,我们更舒服,我们搞得更好一些。逼我们还债,现在还得差不多了,明年就还清了。”^{[3]602}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这是错误的,不,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要。还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更要自力更生。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的思想的进一步加剧,人们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对外经济技术交往被指责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崇洋媚外”等。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外资就被打入了冷宫,被列为禁区。1969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显然,这个时候是以有外债为羞耻的,而把无债当成是无尚光荣的事情。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3]648}这种说法,似乎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失去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可能性。1972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这种政策在1974年中国外贸部发表的文章中再次被重申:“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二、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毫无疑问都认识到了外资对于贫穷落后条件下的中国搞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并能正确地看待利

用外资和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但是随着他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的绷紧,他的思想就越来越偏离原来的正确主张,把独立自主进行绝对化的理解。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的弱小使得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很难得到平等的地位,总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建国初期,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并不允许新中国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这一点邓小平总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0]而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金也往往要忍辱负重。从前面毛泽东对听涛的讲话就可看出。实际上,苏共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缺乏平等的传统,在中苏经济交往中经常表现出来。苏联一些官方人士也感到苏联某些方面做得过分,如赫鲁晓夫回忆说:“顺便说说,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个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这种开发掠夺是一件坏事。”苏联外交部曾经在检讨和新中国的最初交往时也说:“中苏关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主要是指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那些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11]一旦中国争取平等、捍卫主权时,苏联就利用撤退专家、停止外援相威胁,并用苛刻的条件逼中国还债,这极大地挫伤了毛泽东利用外资的热情和信心。为了民族尊严和主权独立,毛泽东作出了偏激的反应,并对外资的利用也产生一些抵触情绪。

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囿于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中国还是采用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否定市场,否定价值规律,是一种封闭的体制。这种体制在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集中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彻底否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使外资企业没有了立足之地,也排

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可能性。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单一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它与经济国际化趋势背道而驰,无法与世界经济接轨。计划经济体制也使中国社会缺乏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动力和压力。在这种体制里,生产、销售都是政府指令性的,大型工程也是政府主导的,资本市场是关闭的。社会缺乏强大的市场需求和资金需求,在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体系后,外资也不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体制的束缚阻碍了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实施。

第三,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马恩著作里面,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实际上马恩著作里面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由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化而来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照抄照搬马恩著作的原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违背了经济规律。

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产生了消极影响。“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是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建立了合作和互助,特别是由于经济上强大的苏联的存在,由于相互帮助以及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自己还有大量商品输往他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存在和不断壮大,资本主义市场会日渐弱小,从而西方强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逐步加深,并有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首先爆发战争。在这一理论提出之初,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相互援助和调剂,在经济恢复和初期建设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有限的成就反过来增强了一些人的形而上学观念,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经济关系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受此影

响,毛泽东长期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一旦与苏联的经济交往因为国家利益冲突而终止时,便放弃了利用外资的想法。

第四,毛泽东偏执的“国际主义”和“传统大国”思想的消极影响。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把中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认为对外援助责无旁贷。为了张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了突显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经常不惜代价地给予别国以慷慨的经济援助,却拒绝人家在中国遭遇自然灾害时的人道援助。这样利用外资就无从谈起了。毛泽东曾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12]。毛泽东这种重国际友谊之“义”轻国家狭隘民族之“利”的思想无疑对中国利用外资产生了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7.
- [3]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4]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116.
- [5] 倪大奇.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 [6] 杨荣绅.对外开放纵横谈[M].北京:求是出版社,1985:157.
- [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
- [9]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41.
- [10]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7.
- [11] 孙泽学.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J].新华文摘,2004(18):54.
- [12] 高凯,于玲.毛泽东大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40.

注释:

- ① 见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陈可阔]